

拓展阅读二：

文献来源：《农业考古》1999年04期

试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茶文化精神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施由民

中国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几千年来,茶文化之花之所以在中国大地上常开常新,就是因为茶能符合中国国民的内在追求,从而茶文化精神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茶文化精神也反映了中国的国民性。

中国茶文化之花是由具有中国特性的国民浇灌和培育出来的,即中国国民性规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内在特质(即茶文化精神),因此,要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中国茶文化,就必须首先理解和认识中国人,即中国的国民性。

一、 重视现实人生是中国国民的特性也是中国茶文化的精神

在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塑造中国国民特性的主要思想是儒家和道家。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有多层含义。其中的一层,也就是对中国国民的一大塑造,就是重视现实人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这是对人生的充分肯定。中国国民不舍弃或轻视现实人生,而是在现实世界中保持或追求幸福和快乐,即“道在伦常日用中”,这便是孔子的“仁”对中国国民的塑造。

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补充,对中国国民性的塑造也起了重要作用。

道家尽管是崇尚洁净虚无,去尘离俗,恬淡无为,然而,他们仍然是重视现实人生,他们修炼长生术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求得生命的延续,仍然是为了活得更好,更有质量,这就是道士们所向往的轻身换骨,羽化成仙。

无论儒家也罢,道家也罢,对中国国民性的塑造之一就是重视现实人生。

中国茶文化是由中国特性的国民所创造、培养和发展,因而重视现实人生也就成为中国茶文化的内在特质之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种种品茶赞茶的文化表现说明了这一点。

茶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得志时怡情、修性的重要手段,而茶更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失意时安慰人生、平衡心灵的重要手段。因为茶中有人生的满足,使得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即使遭受巨大的打击和不幸,也不陷入宗教的迷狂或深沉的忧郁。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失意文人品茶赞茶的历史或情感体验。

中国茶学第一人——茶神陆羽,尽管看透人生:“不羨黄金垒,不羨白玉杯,不羨朝人省,不羨暮入台”,然而,他没有沉入佛门避世,而仍然执着现实人生。不断地对现实人生探索,而达到了人生的高境界,将儒、道、佛融于一身,才写出了茶学经典《茶经》。

自陆羽之后,历代茶人正因为重视现实人生,才有如此多的咏茶之诗和茶学著作。文人士大夫们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以茶励志,以茶修性,而失意时或经历坎坷时则从品茶的境界中寻得心灵的安慰和人生的满足。

唐代诗人韦应物说:“为饮涤尘烦”一饮茶能消除人世间的烦恼。韦应物是个失意文人,在现实社会无法施展才华,便消沉隐退,在茶盅中享受人生。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后半生仕途不畅时,便退隐山林,在恬淡宁静中以茶相伴、享受人生:“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碗茶。……无忧无乐者,长短任天涯。”被誉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宦途不得志而毕生致力于创作,创作了大量的茶诗,在茶中享受“闲远古淡”的人生。

南宋大诗人陆游也是因为壮志难酬,而在茶中寻得慰藉,创作了唐宋诗人中最多的茶诗。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中国历史上失意的文人士大夫们沉湎于茶艺或茶道,在茶中享受人生,在茶中倾注中国的儒释道思想。

二、追求人格完善是中国国民的显著特性也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精神

中国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莫定于孔子“仁”的思想,两千多年来持久而稳定地承续下来。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晶,而中国农业社会在两千多年中没有大的变化,即封闭而稳定地发展。因而孔子所奠定的这么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在封闭而稳定的农业社会的环境中承续不断,后世的思想家们也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了孔子思想的某一方面。

孔子“仁”的一大特性就是突出了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而极力强调学习和教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通过追求知识、勤奋学习和讲求控制、锻炼意志而达到伟大的人格: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2]

这就是孔子的个体伟大的理想人格。

孔子所树立的理想人格,经过孟子的发展得到了极大地高扬,孟子说: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3]

这些经典名句,两千多年来,激励着中国的国民,而成为中国国民的性格,特别是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理想。中国茶文化主要是由中国文人士大夫所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追求人格完善成为中国茶文化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茶学的开山祖陆羽,就是把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他在《茶经》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于是,“精行俭德”成为历代茶人的格言。陆羽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实践和修炼“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他的《六羡歌》:“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充分表现了他独立自由的人格,在茶与山水中寻得人生的满足。

唐代有一批诗人都是以茶来排解烦恼,磨励志向,完善人格。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中称茶:“洁性不可污”。唐僧皎然称茶:“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唐人裴汶对茶性的体验:“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因而茶成为国人锻炼意志的手段:“至其冲淡、简洁、高尚、雅清之韵致。”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一生屡遭坎坷挫折,而茶叶则成为它个人追求高洁、刚正纯朴的品格象征。其所作《叶嘉传》最能反映他追求的理想品格:刚正不阿又恬淡飘然。在《叶嘉传》中称赞茶叶“风味恬淡,清白可爱”,“容貌如铁,资质刚劲”,这实际上就是苏轼自身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苏轼的另一名言:“从来佳茗似佳人”,也是反映了他高洁的人格追求。

大文豪及史学家司马光则把茶比作君子:“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不同。”茶中有完美的人格,司马光通过赞茶表达了个人人格的追求—做君子,不做小人。

即使身处富贵乡的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也是把品茶看作人格的修炼,他称赞茶“至若茶之为物,擅瓠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因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

啜英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虽下士放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

元明清的茶人如唐宋文人士大夫一样，在品茶中，在茶艺或茶道中追求人格的完善。

明代屠隆夸《考磐余事》中对品茶人品的要求：“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篙莱，罪莫大焉。”茶道或茶艺必须要德行高修养好的人才能得到茶中的审美境界。

晚明众多茶人则在内困外忧中，更是在茶艺中走向内向心性的修养，在清赏闲适中避世。

三、讲求和谐是中国的国民性也是中国茶文化的精神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民族是一个十分强调和谐统一的民族。

最早奠定中国民族这一特性的仍然是远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孔子的礼“要求保持、恢复并突出地强调相对温和的远古氏族统治体制”，“又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4]孔子的“仁”是要维护“礼”的，即要维护“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统治体系”。^[5]而这个“礼”的最大特征就是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世间关系中，构成和谐统一的关系。

对中国国民性的塑造起了较大作用的《老子》，尽管没有明确地强调“和谐”但它所主张的“贵柔守雌”，不冲动，不狂热，冷静而理智的生活智慧，强化和补充了孔子所主张的“和谐”。

明确提出和谐中庸思想是战国时期的《中庸》一书。此书继承了孔孟提倡发愤修养的思想，同时提出了中庸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

个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这一儒家思想经过秦汉和宋明时代的不断强化，在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对维系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深入国民骨髓而成为重要的国民性。

中国茶文化就是在中庸、和谐的环境中，由具有中庸、和谐特性的中国国民培育、浇灌出来的。因而讲求和谐成为中国茶文化应有的内在特质。

陆羽《茶经》一书的内在核心是寻求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所要达到的便是一种和谐，一种人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有机和谐。

茶是一种中正平和之物，通过煮茶品茶能平和人的心情，茶的审美境界能消除

人的烦恼,因而,茶得到讲求和谐的中国国民的特别喜爱,唐人裴汶对茶性的体验:“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即饮茶能平和人的心情,并能“至其冲淡,简洁、高尚、雅清之韵致。”唐末刘贞亮对饮茶功用的总结:“以茶散闷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性。”宋徽宗《大观茶论》则说,茶因察有山川的灵气,因而能“祛襟涤滞,致清导和”。

讲求和谐的中国国民,培育了讲求和谐的中国茶文化之花,而和谐的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又起了重要作用。

四、进入庄禅式的审美境界是中国国民的审美特点更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精神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生?孔子和孟子都主张发愤修养,努力学习,“克己复礼”而达到“仁”的境界。老子主张冷静理智,不冲动、不狂热。荀子则主张用现实社会秩序规范来改造自己。而《易传》则主张乐观而积极奋斗,即“刚健有为”,这些思想都成了中国国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国民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以庄禅式的审美来对待人生、对待生活。

庄与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种不同的思想,然而,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在审美境界上却是相通的。

庄子所探索的是:在现实的苦难,在强者的卑劣的黑暗社会中,个体的身(生命)心(精神)如何存在的问题。他探索的结果是必须采取对整体人生审美观照的态度,这就是不计利害、不计是非、不计功过,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从而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也就是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没有否定人生、否定生命,而深深地爱护人生和生命,自自然然而合规律性地和宇宙合为一体,进入审美的人生境界。

禅是佛教的中国化,它修炼的方法是“悟道”,即采取直觉的方式来参悟世界、宇宙、人生、生死等,它所要进入的境界是“瞬刻永恒”^[7],即超越一切物我人己界限,与对象世界(例如与自然界)融为一体,凝成永恒的存在。这是一种高级的审美境界,一种精神的愉快和欢乐。

庄子和禅的审美境界是相通的,最终就是要超越现实的苦难世界,寻求精神的愉悦,和宇宙合为一体。而且庄子和禅都喜欢在大自然的风景中,去感受审美的愉快,去达到超功利、无思虑。

无论庄也罢,禅也罢,都是对人生、生命、自然采取肯定的态度,采取高级审美的态度。

庄禅的人生审美态度补充了儒家的思想,而深入中国人的骨髓,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在他们遭受巨大不幸时,仍然能热爱生命、重视现实,因为有庄禅的审美境界可寻得人生的安慰、生命的乐趣。

中国自古有“茶禅一味”之说。茶禅何以一味?其味就在于都是以对人生、对生命,乃至宇宙、世界采取审美的观照,达到高级美妙的愉快境界。在这一点上,庄禅茶都是一味的。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的根抵全在道家。这个“根抵”就是庄禅的审美境界。中国茶文化是由庄禅审美性格的国人培育出来的,自然,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审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茶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如果茶道或茶艺或者说品茶达不到这样一种审美的境界,或者说没有这种审美的功能,茶文化之花也就难以在中国大地上几千年常开常新。中国大量的茶诗或茶著作都是在赞美或描述这样一种庄禅式的审美境界或审美体验。

陆羽在《茶经》中描述饮茶:“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身心不舒,只要喝几口茶水,便可身心舒泰,如甘露灌顶,美妙得很,这是一种审美体验。唐代诗人皇甫曾描述陆羽采茶时的境界:“千峰待通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羨独行。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夜,相思一磬声。”这是一幅超然脱俗的图景。茶圣陆羽就是在这么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中,寻得研究茶的快乐。唐僧皎然描写陆羽品茗时的悠然自乐,则更体现了陆羽的与众不同:“何山赏春茗?何处寻春泉?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这是超然脱俗、遗世独立的美妙境界。

在中国茶文化史中,唐代诗人卢全的“七碗茶”诗极其夸张而浪漫: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诗人卢全在饮茶中进入了人生的高级审美境界,把孤闷、平生不平事通通抛弃了,而要羽化成仙,进入蓬莱山这样的人间仙境,茶竟是如此美妙!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后半生仕途不畅,即是在煮茶品茶中求得心灵的满足,人生的快乐:“山茗煮时秋雾碧,玉杯斟处彩霞鲜。临阶花笑如歌妓,傍竹松声当管弦。虽未学穷生死诀,人间岂不是神仙。”山林、彩霞、鲜花、竹林,伴之于朦胧的雾霭和松涛,煮茗享受,而进入神仙境界。这实际就是禅茶一味。

唐代诗人元稹的著名茶诗《茶》中描述他煮茶品茶中的人生满足:“茶。香

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铤煎黄蕊色,婉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邀明月作陪或与朝霞相对,煮茶品茶,谈古论今,那种美妙的滋味,令人陶醉无法夸说。

唐代大诗人、大书家颜真卿,邀集僧俗之客于香花芳草的庭轩里,在皎洁的月光下,饮茶作诗,写下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描述了对人生的美妙体验,其中颜真卿的两句最为美妙:“流华净肌骨,疏澹涤心源。”

上述几位诗人对饮茶境界的体验,仅仅是众多文人士大夫中的代表,唐代大量茶诗是记录茶中审美的体验或赞美和留恋这种庄禅式的审美体验。而宋代众多的文人士大夫也写了大量的这种茶诗或茶词,如苏轼、梅尧臣、陆游、辛弃疾等大文豪,这些人也大多是仕途不畅或壮志难酬,而在茶与山水中寻得心灵慰藉,人生的满足。因为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中煮茶品茶,能与宇宙、自然融为一体,人世间的一切不顺都可抛置脑后,这也是中国文人的生存智慧—在品茶中与山水辉映中寻得生命的乐趣和生活的力量。豪放派诗人苏东坡说:“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何等的美妙!

明代的文人、士大夫、隐逸品茶、鉴茶仍然是以庄禅式审美为指归,在大量的茶著作中叙述了达到这审美境界的手段和途径。

明代屠隆《考槃余事》中说:“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赏鉴者矣。”即要白石清泉,还要煮茶得法,更要长期体会,才能进入这种身心舒泰、令人陶醉的美妙境界。

明代陆树声退官隐居田园后,沉酒于品茶的禅境为人生的最大满足和生活的乐趣。他在《茶寮记》中叙述了他对这种禅境的营造:“园居敞小寮于啸轩埤垣之西,中设茶灶,凡瓢汲罍注濯拂之具咸庀。择一人稍通茗事者主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则茶烟隐隐起竹外。其禅客过从予者,每与余相对,结跏趺坐,啜茗汁,举无生话。”

明代隐士张伯渊,“志甘恬澹,性合幽栖,号称隐君子,其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余,汲泉煮茗以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8]其所著《茶录》一书对饮茶境界的体会就是要独自一人品茶,才能进入忘乎一切的审美境界:“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

独自一人静坐饮茶以达“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这是明代茶人所特别强调的。徐谓在《徐文长秘集》中对“寒宵兀坐”品茶独有体验,而罗廩在《茶解》

中也描述：“山堂夜坐，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清芬满杯，云光滟潋。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冯可宾《茶笈》饮茶十三宜的第三宜也即“独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明的文人士大夫由于所处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思潮，他们反拨宋儒理学而更多地吸收了庄、禅及道家思想，茶艺和艺术鉴赏、山水景物，甚至纵情声色成为“率性而行”的手段。他们追求自然人性而特别注重在具有幽趣和雅趣的茶道中“尽己之性”。

在茶艺或茶道中寻得庄禅式的审美境界，仍然是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文人的生活乐趣、生命的安慰。如现代文人林语堂说：“清茶一壶便可随遇而安”。这是典型的在茶中审美而获得生活乐趣的现代文人。

五、余论

任何文化都具有两重性，有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合理性和合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积极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极的文化也会部分变成保守甚至落后的文化。

辩证地看，中国茶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特质，在维持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中国茶文化也助长和促进了中国文人士大夫那种封闭自守、克制和压抑的奴隶性格，满足于精神上的人格完善即“安贫乐道”的心理状态，从而形成历史的惰性。当然，这种历史的惰性主要根源于中国几千年封闭的农业社会，茶文化则起了促进作用。然而，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小农社会的封闭已被打破，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工业化在不断向前迈进。由于市场经济的求利性、竞争性及等价交换等特点，高扬中国茶文化精神在当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发展中国茶文化，有利消除尔虞我诈，使人们愉快和谐地生活在一个既有高度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环境中。

注释：

[1][2]孔子《论语》。

[3]《孟子》。

[4][5][7]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中庸·第一章》。

[8]吴江顾大典题张伯渊《茶录》。